臺大中文學報　第三十一期
2009年12月　頁103～146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論鮑照詩的評價及風格判斷問題

——「休鮑」論、「險俗」說衍議

李　錫　鎮*

提　　要

對鮑照詩的負面批評，在現代學者論述中頗多著墨，不但低貶其作品，甚而非議其人格。若考察其論點，大多與「險俗」說、「休鮑」論有關，前者本於鍾嶸《詩品》，後者出自顏延之，承其說者在解釋上極爲紛岐，亦多互爲牽連。然而，在文學史上大致又多認定鮑照是繼顏延之、謝靈運之後劉宋主要的詩人，故宜當有辨。

本文將探索「休鮑」論、「險俗」說的立論取向及其衍生的解釋問題，辨析古來對鮑照詩持負面批評的主要論點。力求正本清源，希望有助於化解有關鮑照詩批評上的爭議，並給予較爲合理的評價。

關鍵詞：鮑照、顏延之、「休鮑」論、「險俗」說、《詩品》

本文於98.08.31收稿，98.11.25審查通過。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eexamining the Criticism of Bao Zhao's poems: The Ideas Behind "*Xian Su*," "*Xiu Bao*" and The Critical Stances They Engender

Lee Shi-chen*

Abstract

A number of modern scholars have been highly critical of Bao Zhao's poetry, many of them directing their condemnation not only at his poetry, but at his personal character as well. Most of criticism of Bao Zhao is influenced by of the appraisal in Zhong Rong's *Shi Pin* (Poetry Gradings) of Bao Zhao, using the term "*Xian Su*" (險俗) and Yan Yan-zhi's use of the term "*Xiu Bao.*" (体鮑) (referring to the poetic style of Bao Zhao and Tang Hui-xiu). A number of variations have proliferated from these critical stances, many of them interrelated and none in complete agreement. However, in general, Bao Zhao has been generally recognized as an important poet of Liu Song Dynasty in literary history behind Yan Yanzhi and Xie Lingyun.

This study will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ideas behind *Xiu Bao* and *Xian Su*, and problems that derive from divergent evolution along these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oretical lines, while analyzing the major points of negative criticism against Bao Zhao's poetry. The study will do its best to thoroughly rework and begin to resolve the critical disputes over of Bao Zhao's poems, and ultimately offer a more reasonable evaluation.

Keywords: Bao Zhao, Yan Yanzhi, *Xian Su*, *Xiu Bao*, *Shih Pin*, criticis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論鮑照詩的評價及風格判斷問題

——「休鮑」論、「險俗」說衍議*

李　錫　鎮

一、序　　論

鮑照（約414-466）年輩晚於顏延之(384-456)、謝靈運(385-433)，三人詩風各具特色，均曾引動風潮，深刻影響到齊梁人的詩歌創作，可說是南朝劉宋時期重要的詩人。然而鮑照在世之時，顏延之就已低貶其詩，鮑照也有「才盡」之說。有關鮑照詩的風格和評價，隨著對當時創作的影響，遂成爲齊梁詩歌評論中爭議的問題。較爲明顯透露這方面訊息的是《詩品》，在這部帶有時評性的論詩專著中，鍾嶸也表達其觀點與立場。治六朝文學與批評的學者論及鮑照，運用齊梁文史資料，大多逕引詩評家的見解作爲論述之佐證，資料間的關係，鮮少區辨，頗易混同。尤其近來對《詩品》中涉及鮑照詩的兩則負面批評——顏延之所立的「休鮑」論、摘引自鍾嶸評語的「險俗」說，似乎更有被放大解釋的現象，是否違離鍾嶸表述意旨，或過度貶低鮑照詩，則不能無疑。

「險俗」說出自《詩品》中「宋參軍鮑照詩」條：

> 其源出於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諔詭，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

* 本文爲國科會 97 年度研究計畫 (NSC97-2410-H-002-172) 之部分執行成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多以附照。

傳統詩文評之論述，語辭簡練，又常運用比喻性的語言，頗爲費解。但是留意其表述結構與行文意向，仍可知曉其評論觀點。鍾嶸前褒後貶，中間流露讚賞和感歎。「總四家（張協、張華、謝混、顏延之）而擅美，跨兩代（晉、宋）而孤出」，按張協《詩品》列入上品，其餘皆爲中品，集四人詩之長處於一身，詩風又崛然特立於晉、宋兩代，顯然言其自成一家，而與顏、謝立異，可謂推崇之至，理應可以列入上品。[1] 僅就此條來說，鮑照屈居中品，當與下文「然貴尚巧似」數句之貶抑有關。《詩品》言及「尚巧似」者，還有張協、顏、謝，[2] 可見缺點出在過度追求形似。鍾嶸言鮑詩修辭上的缺失是「不避危仄」，「危仄」雖與「險俗」義近，亦不可逕將鮑詩的語言表現與「言險俗者」等同看待，因爲後者刻意在構詞造句求新奇工巧，常流於穿鑿取新之弊，而鍾嶸認爲鮑照的主要用意是爲追求形似，才不迴避危仄。若形似是內容表現上的逼眞生動，倘能得其形似，修辭不夠清新流暢或雅馴，雖有瑕累，又豈可厚非？

細察《詩品》行文，所謂「言險俗者，多以附照」，指創作上追求險俗者大多依附鮑照，並不是說鮑詩「險俗」；即使是「危仄」與「險俗」詞義相近，指涉對象亦不宜混淆，或斷章取義，否則釋義時不免曲解。[3] 鍾嶸評鮑詩「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若配合「言險俗」一句來看，意指鮑詩之缺失是過於追求抒情寫景或狀物之逼眞，不規避險僻或卑俗的詞句，頗與清新典雅之格調不合，這是詩歌表述上遣詞構句的用言問題，故不應從詩歌表現的內容去解釋，也不是指鮑照古樂府中七言和雜言不便入樂的作品，或指

[1] 古直注此二句云：「案此評非上品不可，益信列照中品，非嶸定制。」見《鍾記室詩品箋》（臺北：廣文書局，1990 年 12 月），頁 27 。

[2] 見曹旭：《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10 月），頁 149 、160 、270 。

[3] 有關其語義解釋的爭論，詳參蘇瑞隆：《鮑照詩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1 月），第八章〈南朝文人對鮑照五言詩的評價〉，頁 272-294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鮑照撰寫南朝流行的吳歌西曲，倘若如此理解，似已偏離《詩品》的論述。此外，鍾嶸是否認爲鮑照多數作品的語言修辭「不避危仄」？依據鍾嶸褒讚語「善製形狀寫物之詞」一句，相互對照，可推「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的作品不應過多，否則鍾嶸論述就是前後矛盾。倘若上述粗略分析無誤，如果援引《詩品》而統言鮑詩「險俗」，其說法應是難以成立。猶待討論的是：鍾嶸不列鮑詩於上品，其評價依據，可否是因爲少數作品有疵病？或因其對齊梁詩歌產生不良影響？或因崇「雅」卑「俗」的文化理念或審美標準？

「休鮑」論載於《詩品》下「齊惠休上人、齊道猷上人、齊釋寶月」條：

> 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照，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顏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鮑之論。」

此條訊息甚多，包括「休鮑」論最初的立說者是顏延之，指證者羊璠之點明其立說動機是「忌」，鍾嶸加以載錄，並對當世流傳的此一說法提出駁議。據此可知，鍾嶸明確表示反對「休鮑」並論，認爲湯惠休詩風「淫靡」，即過於綺麗，而對鮑照褒讚有加，言其風格有張華詩華麗柔美的一面，[4] 又兼得張協、謝混、顏延之諸家優點，言其「才秀」，湯惠休則是才少情多；以商不敵周爲喻，言湯惠休詩比不上鮑照，並將其列入下品。因此，若說《詩品》認定鮑詩風格「險俗」，且將之與「休鮑」論相互牽聯，相信鍾嶸不會首肯。應該更作討論的是：顏延之立「休鮑」論，若原因是「忌照之文」，此當如何理解？鍾嶸嗟歎鮑照「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此事是否可能相關？若如鍾嶸所言，鮑照詩風薈萃四家之長，湯惠休難以比肩，何以顏延之所立之說竟能流傳齊梁？鍾嶸從創作才能與詩風判斷，反駁顏延之立論，是否可能讓其當代讀者信服？《詩品》分品論詩，休鮑高下有別，旨意可曉，何以後代詩話或評選中，有將「險」、「俗」等字眼另作解釋，用以非議鮑詩？

《詩品》尚有七處提及鮑照，有關鮑照其人其詩，齊梁文史資料仍然保存

[4] 鍾嶸言鮑詩「含茂先之靡嫚」，《詩品》中評張華詩言「其體華豔，興託多奇，務爲研冶。」同註 2 ，頁 216 ，校異部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少。如沈約《宋書》、虞炎〈鮑照集序〉、蕭子顯《南齊書》，均在《詩品》成書之前；[5]鍾嶸之後，則有蕭統《文選》、徐陵《玉臺新詠》。倘若能夠設法釐清這些資料之間的相關性，並從鮑照詩文尋求論證，或可對上述諸多問題有所澄清，而有助於鮑照詩較爲合理的定位。

二、以《詩品》爲主軸
論南朝時期對鮑照詩的評價與風格判斷

顏延之立「休鮑」論，用意是爲了低貶鮑照詩，羊璿之言其因素是「忌照之文」。「忌」字之詞義，自先秦以來之語用有多種，[6]與此較爲相關者，一是憎惡，一是妬忌。前者不必是私心或可基於義憤，即顏延之不認同鮑照詩風，又唯恐其影響當時或貽誤後學；後者則是畏懼他人勝過自己，偏重私利，即顏延之體察鮑照詩風有其優越性，害怕文學聲望被掩蓋或取代。如前所述，鍾嶸反對「休鮑」並論，讚揚鮑照「跨兩代而孤出」，但也言其作品「不避危仄」，而造成不良影響；若「忌」字解爲憎惡，對照鍾嶸論點來說，顏延之低貶鮑詩儘管抑揚過當，卻能洞察機微，預知其流弊。如果「忌」字解作妬忌，

[5] 據沈約《宋書・卷一百自序》，此書成於齊武帝永明六年（488）二月，見《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11 月），頁 2466 。虞炎奉齊文惠太子蕭長懋之命，爲鮑照編集，未詳言編成時間，文惠太子卒於永明十一年 (493) ，當在此年以前完成〈鮑照集序〉，見錢仲聯：《鮑參軍集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 年 2 月），頁 5 。蕭子顯《南齊書》，據劉知幾《史通・外篇・古今正史》言「梁天監中，梁太尉錄事蕭子顯啓撰齊史，書成表奏之。」見趙呂甫：《史通新校注》（四川：重慶出版社，1990 年 8 月），頁 730 。梁武帝天監計十八年 (502-519) ，「天監中」應是天監九年前後。鍾嶸《詩品》，大致完成於天監十二年至十八年間。參王師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所出版，1992 年 3 月），頁 13 。

[6] 參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 年 8 月），頁 225 。張萬起：《世說新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年 2 月），頁 104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顯然不利於顏延之，鍾嶸是否可能如此理解？顏延之是否如此爲人？《詩品》中「宋光祿大夫顏延之詩」云：

> 其源出於陸機，故尚巧似，體裁綺密。然情喻淵深，動無虛發；一字一句，皆致意焉。雖乖秀逸，固是經綸文雅才；才減若人，[7]則蹈於困躓矣。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詩如錯彩鏤金。」顏終身病之。

顏、謝並稱，鍾嶸言「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列謝上品，顏中品，顯已區分出高下；此處先論顏詩風格及優缺點，後引湯惠休語，以證成其說。惠休評比顏謝語，《南史》亦有類似記載，唯評論者則是鮑照；其敘事頗多，可資參照，引述如下：

> 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縣絕。文帝嘗各敕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己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延之每薄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後生。」是時議者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南史・卷三十四顏延之傳》）

顏延之長謝靈運一歲，謝於宋文帝元嘉十年 (433) 被誅，年四十六，顏卒於宋孝武帝孝建三年 (456)，年七十三，其間相隔二十三年；鮑照之出生約晚於顏、謝三十年，自屬後輩。據引文來看，劉宋時期詩評風氣甚盛，顏、謝在宋文帝時早已齊名，且在謝生前亦曾應帝王要求有過較量，鮑照評顏謝較可能在謝歿後。值得留意的是，顏延之竟要後輩當面比較「己與靈運優劣」，若眞有其事，顏延之當是以詩自負，且在意其詩名，也可能有與謝靈運爭勝之心，而被要求評論的鮑照，亦須在詩歌方面具有足可讓顏延之肯定的才識，否則無論顏延之是虛心請益，或要考驗鮑照，抑或想要專擅詩名，都將失去意義。唯顏延之提問的議題涉及自身，似乎極不得體，回答者又爲後輩，更易令人左右爲

[7] 此二句文字，參見王師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頁 269 、 270 ；曹旭：《詩品集注》，頁 271 、 272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難。《南史》與《詩品》記載，評語均爲形象化語言，內容相近，表意含蓄，差異在評論者不同，《詩品》未交代湯惠休評論的背景，《南史》則不言顏延之的反應，由於史料不全，難以確定是傳聞異辭，抑或二事並存。如果再參照兩處敘事，《詩品》載顏延之聽聞惠休評語後「終身病之」，而《南史》又記「延之每薄惠休詩」，此二事無論孰先孰後，或惠休詩是否確實風格俚俗如民間歌謠，其間似乎針鋒相對而彼此關聯，尤其是描述語「終身」、「每」字，顏延之的反應又似有過當之處。因此，《詩品》所謂「顏終身病之」的「病」字，或當意指不滿或懷恨，正如「是顏公忌鮑之文」，應有可能作忌妬解，涉及前輩與後進之間文學聲望的競爭，心生妬忌而故意傾軋。

忌妬似乎是帶有主觀性的自私情緒，其實乃與人際社會的競爭有關，蓋因文學聲望的升降消長，可能會牽動政治利益與社會地位的變化。關於顏延之的爲人，《宋書》本傳敘事頗詳，記載其被尚書左丞荀赤松彈劾而免官，奏疏有言「外示寡求，內懷奔競；干祿祈遷，不知極已；預讌班觴，肆罵上席」。又載其自負才學，曾與傅亮、釋慧琳爭名要寵之事，云：

> 徙尚書儀曹郎，太子中舍人。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辭，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復爲祕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太祖所賞愛，每召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臺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宋書・卷七十三顏延之傳》）

傅亮博涉經史，尤善文詞。劉裕篡晉時，受命、表策文誥，皆傅亮所撰，故自命爲一時文宗。顏延之恃才傲物開罪傅亮，事在宋武帝永初二年 (421)，時傅亮爲尚書僕射、中書令。[8] 劉裕次子廬陵王劉義眞喜好辭義，與謝靈運、顏延之、釋慧琳，情款異常，時在晉安帝元熙元年至宋武帝永初三年 (419-422)。[9]

[8] 參繆鉞：〈顏延之年譜〉，《讀史存稿》（臺北影印本，無出版年月），頁 141、142。

[9] 同前註，頁 142、14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顏延之詆訶慧琳事，在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 (445) 左右。[10] 顏延之自負才學而好爭名，不僅對帝王、寵臣、朋友無所顧忌，在大庭廣衆之下或帝王面前，也曾對後生晚輩不假辭色或譏諷調侃之事：

- 元嘉三年 (426)，羨之等誅，徵爲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既以才學見遇，當時多相推服，唯袁淑年倍小延之，不相推重。延之忿於衆中折之曰：「昔陳元方與孔元駿齊年文學，元駿拜元方於牀下，今君何得不見拜？」淑無以對。（《南史・卷三十四顏延之傳》）
- 孝建元年 (454)，遷左將軍。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別離，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日。（《南史・卷二十謝莊傳》）

以上所引諸事，可見自劉宋初期直至顏延之晚年，均因文學聲望事關政治利益或地位，而與人彼此折衝，風波不斷。以顏延之爲人來看，對於後起之秀無論顏謝優劣議論者是湯惠休或鮑照，儘管其評語仍可被理解爲平分秋色，都可能讓好強爭勝的顏延之認爲在說顏不如謝；倘若發此議論的並非鮑照，而鮑照詩風獨特，又在當世嶄露頭角，「顏公忌照之文」而刻意低貶，故立「休鮑」論，或是不無可能。

鍾嶸嗟歎鮑照「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此語須如何理解？[11] 是否可能

---

10 參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學史料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7 月），頁 356 。

11 歷來解釋與此相關者，或言「史不立傳」，或言「高才而無貴位」。見王師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頁 287 ；曹旭：《詩品集注》，頁 295 、 296 。唯鍾嶸之前，沈約《宋書》已以「帶敘法」將鮑照傳附於臨川王劉義慶傳中。有關「帶敘法」，見趙翼：《廿二史箚記及補編》（臺北：鼎文書局，1975 年 3 月），頁 182 ；丘敏：《六朝史學》（南京：南京出版社，2003 年 11 月），頁 303 。又《詩品》論詩重「才」，列入評論之詩人，亦多才高位卑者。故兩種解說，似可斟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鮑照詩未獲當代合理評價有關？基於《詩品》重在論詩，而全書論述體系又有其關聯性，似乎可從這一角度思考。經由前述討論，首先似難排除有來自顏延之立「休鮑」論的因素。按《詩品》評湯惠休條所述，齊梁人將休鮑並提，鍾嶸應已認定源自顏延之的「休鮑」論，甚且此一說法也已在劉宋時期流傳。蓋因指證者羊璿之乃劉宋時人，曾爲謝靈運「四友」之一，仕宋，孝武帝大明三年 (459) ，竟陵王劉誕事，牽連被誅。[12] 又《詩品》下「齊黃門謝超宗、齊潯陽太守丘靈鞠、齊給事中郎劉祥、齊司徒長史檀超、齊正員郎鍾憲、齊諸暨令顏測、齊秀才顧則心」條云：

> 檀、謝七君，並祖襲顏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從祖正員常云：「大明、泰始中，鮑、休美文，殊已動俗。」唯此諸人，傳顏、陸體，用固執不移。顏諸暨最荷家聲。

依據鍾憲語，孝武帝大明 (457-464) 、明帝泰始 (465-471) 年間，休鮑詩「殊已動俗」，足見劉宋時期二人已被連結並稱，而顏延之卒於孝建三年 (456) ，雖不知其立論在何時，時間極爲接近，又諸人詩風「祖襲顏延」，因此休鮑連稱應與其立論難脫干係。值得玩味的是，「殊已動俗」一語，乃因顏延之立論原本欲低貶休鮑詩，竟適得其反而引起世俗普遍的關注；換言之，若無顏延之的說法，鮑照或惠休詩或許不會有衆多的讀者群，或創作者的跟隨。按鮑照卒於泰始二年 (466) ，依此條資料顯示，當其在世時，亦即顏延之死後，劉宋後期，其詩歌作品既已流傳，甚且休鮑詩也有取代「顏、陸體」之勢，就此現象而言，是否仍可說「取湮當代」與顏延之的「休鮑」論有關？若要釐清這項疑惑，應先慮及休鮑詩的流傳須待顏延之死後，於此可見當時具有極高文學聲望的顏延之，其立論確實曾展現其壓制作用；以鮑照而言，大明、泰始年間已屬生命晚期，而鮑照以其文學才能爲上層階級所知，則遠在元嘉年間。[13] 又「鮑

---

12 《詩品》列羊璿之詩下品，其事蹟見《宋書・卷六十七謝靈運傳》，頁 1774 、1775 ；並參曹旭：《詩品集注》，頁 400-402 。

13 《南史・卷十三宋臨川王劉義慶傳附鮑照傳》，頁 360 ；記載鮑照獻詩臨川王，獲賞識而入仕途，又曾撰〈河清頌〉，均在宋文帝元嘉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休美文」一語，涉及詩歌風格的認知判斷，若按照鍾嶸論詩觀點，惠休「淫靡」或可稱「美」，而鮑照詩風則不止一端，可知此一評語依然秉承顏延之的立論；因此休鮑詩即使「殊已動俗」，依然將兩人詩風混爲一談，鮑照詩仍被低貶，在其生前實質上並未獲得較適當的評價。休鮑詩的評價或風格區辨，此一課題須留待時間略後的齊梁詩評家，尤其鍾嶸《詩品》，關於這點前述略已論及，後文將再作補充。

鍾嶸評論鮑照，慨歎其「取湮當代」，鮑照詩風格判斷和評價問題的淆亂，應不僅顏延之立論低貶其詩一事，此外又與當時流傳鮑照「才盡」之說頗有關聯。據虞炎〈鮑照集序〉云：

> 孝武初，除海虞令，遷太學博士，兼中書舍人。時主多忌，以文自高。趨侍左右，深達風旨，以此賦述不復盡其才思。出爲秣陵令，又轉永嘉令。[14]

沈約《宋書・卷五十一臨川王劉義慶傳附鮑照傳》云：

> 世祖（孝武帝）以照爲中書舍人。上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

孝武帝劉駿爲文帝第三子，元嘉三十年 (453) 討伐太子劉劭弒文帝而即位；其人猜疑多忌，不僅「以文自高」，書法也要專擅一時之名。蕭子顯《南齊書・卷三十三王僧虔傳》云：

> 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掘筆書，以此見容。

詳察這三則資料，鮑照「賦述不復盡其才思」，或「爲文多鄙言累句」，似乎確有其事。鮑照的行爲看似揣摩上意，曲意迎合孝武帝，唯參照王僧虔「不敢顯跡」，不得不用拙筆來寫字，[15] 兩人的反應方式何其相似？在帝王政治權威

[14] 清初所見宋本《鮑照集》，不止一種。參王志清：《晉宋樂府詩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7 年 6 月），頁 288 、289 。涵芬樓影印明毛扆校宋本，「兼中書舍人」注言另一宋本有「時主多忌」五句。見錢仲聯：《鮑參軍集注》，頁 5 。「永嘉令」，或當作「永安令」，丁福林有詳細證說，見《鮑照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10 月），頁 131-134 。

[15] 古「拙」字亦作「掘」，見《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11 月），頁 603 、校勘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脅迫或壓力之下，又怎能不藏鋒斂鍔而刻意退避呢？然而，鮑照亦遂難避免被當時人以「才盡」來譏諷或非議。

《宋書》在「當時咸謂照才盡」句下，又言「實不然也」，無疑是在反駁鮑照「才盡」之說；此語應是史傳作者沈約有所依據或其個人意見。鍾嶸指出鮑照「才秀人微」，肯定其「才」，顯然亦不贊同鮑照「才盡」。又《詩品》下「宋鮑令暉、齊韓蘭英」條云：

> 令暉歌詩，往往辭絕清巧，擬古尤勝。唯〈百韻〉，淫雜矣。照常（嘗）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沖爾。」……

西晉太康詩人左思，家世儒學，出身貧寒。父左熹，初任卑吏，晉武帝擢爲殿中侍御史，遷太原相、弋陽太守；妹左棻，有文才，武帝採爲修儀，姿陋無寵，以才德受禮遇，進位貴嬪。[16] 將鮑照兄妹與左思、左棻類比，此條應是極早的文學史料。由鮑照答語，可推孝武帝發問必涉及兩對兄妹詩文才學的優劣高下之比較。而鮑照答語謙遜，其中又含有抑揚，一則言其兄妹比不上左思、左棻，一則兼又高抬其妹，而拉大自己與左思的距離。孝武帝的發問，必先認定鮑氏兄妹有才，此可不言而喻，故據此條資料當時所謂鮑照「才盡」，亦可不攻自破。假設鮑照自言「亞於左思」，試問對自以爲文章當時無人能及的孝武帝，又將其置於何地？故鮑照的謙遜退藏，不能排除政治權威壓迫這一因素，《詩品》此條記載亦可作爲旁證。唯對孝武帝有所顧忌，以致「賦述不復盡其才思」，或「爲文多鄙言累句」，畢竟有損於創作的藝術品質，而鮑照的退讓，也使他招致同時代人的「才盡」之譏，此事若與顏延之的「休鮑」論合流，顯然將會挫傷或貶低其文學聲望，加深時人對其詩的誤解，鍾嶸言鮑照「取湮當代」，或也應由這方面理解。

鮑照「才盡」說涉及「賦述不復盡其才思」、「爲文多鄙言累句」，即謂其作品在構思與修辭方面有其缺陷，此必降低其藝術價值；又王僧虔「大明

16 參徐傳武：《左思左棻研究》（臺北：明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 年 12 月），頁 32-38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世，常用掘筆書」，大明 (457-464) 是孝武帝第二個年號，終孝武帝在世時，均「不敢顯跡」，長達八年，而鮑照由「孝武初」第一個年號孝建 (454-456) 算起，共計十一年，也如同王僧虔不敢露才揚己，則這一大段時間的作品，應是都不值一觀。倘若如此，鮑照豈非自斷其藝術生命？傳統詩評家知人論世，難道不會懷疑其爲人？據鍾憲言「大明、泰始中，鮑、休美文，殊已動俗」，此一陳述包括作品評價和讀者反應，是經由詩風「祖襲顏延」的鍾憲，觀察鮑照在世時作品的流傳情況；按其評價語「美文」一詞，若鮑照「爲文多鄙言累句」屬實，又如何堪稱爲「美」？難道當時世俗流傳的鮑照詩，皆爲孝建以前的作品？是否所謂「賦述不復盡其才思」、「爲文多鄙言累句」，可能只是一般讀者的看法或誤解，只是不盡符合當代的審美要求，而鮑照則是有意識地改變其詩風？這些問題牽涉作者、作品、讀者之間的複雜關係，若欲設法釐清，先須考量齊梁詩評家的觀點，且要慮及鮑照作品的流傳和保存情況。

鮑照詩文在其生前並未結集成書，齊武帝永明 (483-493) 年間，虞炎奉文惠太子蕭長懋之命，始蒐集流散詩文，編成文集。虞炎序篇幅不長，唯所述鮑照仕歷，尤詳於沈約《宋書》，除交代鮑照作品留存數量，也對其品質略作批評。此篇序文，史料價值甚高，今引述全文如下：

> 鮑照，字明遠，本上黨人，家世貧賤。少有文思。宋臨川王愛其才，以爲國侍郎。王薨，始興王濬又引爲侍郎。孝武初，除海虞令，遷太常博士，兼中書舍人。時主多忌，以文自高。趨侍左右，深達風旨，以此賦述不復盡其才思。出爲秣陵令，又轉永嘉（安）令。大明五年，除前軍行參軍，侍臨海王鎮荊州，掌知內命，尋遷前軍刑獄參軍事。宋明帝初，江外拒命。及義嘉敗，荊土震擾，江陵人宋景因亂掠城，爲景所殺，時年五十餘。身既遇難，篇章無遺。流遷人間者，往往見在。儲皇博採羣言，遊好文藝，片辭隻韻，罔不收集。照所賦述，雖乏精典，而有超麗，爰命陪趨，備加研訪。年代稍遠，零落者多，今所存者，儻能半焉。（〈鮑照集序〉）

宋明帝劉彧爲文帝第十一子，泰始二年 (466) 正月，孝武帝子晉安王劉子勛反對其稱帝，舉兵討伐，即位尋陽，年號義嘉；臨海王劉子頊響應，八月，兵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敗，荊州內亂，鮑照死於亂兵。[17] 虞炎編集，上距鮑照之卒約二十年，[18] 慨歎「年代稍遠，零落者多，今所存者，儻能半焉」，亦即據其推測鮑照作品已大半亡佚。虞炎言其得以蒐羅而編輯成集，乃因「流遷人間者，往往見在」，此應與鮑照詩文在大明、泰始年間普遍流傳有關。虞炎所編《鮑照集》，據《隋書・經籍志》計有十卷，注云「梁六卷」，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均爲十卷，今四部叢刊《鮑氏集》十卷，乃據明毛扆校宋本刊刻，故可能大致保存《隋書》著錄本之面貌，[19] 亦即現今傳世鮑照詩文數量，應與虞炎所輯者相差不多。[20]

據序文所謂「以此賦述不復盡其才思」一語，虞炎所述即劉宋「當時咸謂照才盡」之說。若更作細察，「時主多忌」六句，置於「兼中書舍人」下，「出爲秣陵令」上，對照沈約《宋書》記鮑照「才盡」說，「上好爲文章」諸句同樣置於「中書舍人」下，鮑照身居此一官職，方可「趨侍左右」或有機會與孝武帝答問之事，故鮑照「爲文多鄙言累句」或「賦述不復盡其才思」，其事或許只在任中書舍人時，而非泛指孝武帝在位的十一年，亦即不必如王僧虔長時期不敢露才；或許也非指中書舍人時的所有詩文，都有鄙言累句的現象。按現存鮑照詩文中，任太學博士兼中書舍人時所作確實可考者，如〈爲柳令讓驃騎表〉、〈與謝尚書莊三連句〉、〈月下登樓連句〉，[21] 無論爲人代筆或與人同撰連句詩，相關人物均屬朝廷官員，前者辭意妥貼，符合其人身份；後者

17 「宋景」或作「宗景」，按《宋書・卷八十四鄧琬傳》云：「荊州治中宗景、土人姚儉等勒兵入城，殺道憲、道預、記事參軍鮑照，劫掠府庫，無復子遺，執子頊以降。」頁 2144 。並參丁福林：《鮑照年譜》，頁 161 、 162 。

18 參鄭騫先生：〈龍淵里日鈔〉，《龍淵述學》（臺北：大安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頁 394 、 395 。

19 詳參曹道衡：〈樂府與古詩——《鮑參軍集》的版本談起〉，《中古文學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 1986 年 7 月），頁 435-440 ；王志清：《晉宋樂府詩研究》，頁 288 、 289 。

20 鮑照今存詩二百零四首，計樂府八十六首，古詩一百一十二首，字謎三首，聯句三首。

21 見錢仲聯：《鮑參軍集注》，頁 50 、 417 、 418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描寫景物之句，頗見意象經營之用心，均有騁能使才的傾向。至於非屬中書舍人時的作品，如任秣陵令時的〈翫月城西門廨中〉，蕭統《文選》選入「雜詩」類，[22] 此詩首四句用隔句對，四、五兩句頂眞，描寫樓中隔窗窺月，彎月移動的情態，修辭結構均見心思；而詩中「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更是古來讚賞的警句，堪稱佳作。因此，若說鮑照「爲文多鄙言累句」或「賦述不復盡其才思」，似宜有所限定，不應擴大解釋，或過度申論。

沈約《宋書》記載「當時咸謂照才盡」，如上所述，「當時」似專指鮑照任太常博士、兼中書舍人之時。細察《宋書》行文，沈約雖否定鮑照「才盡」之說，卻未針對所謂「爲文多鄙言累句」提出批評，是否已涵攝在「實不然也」一語之內？抑或認定其「爲文多鄙言累句」，須歸因於外在政治權威逼迫，而非個人主觀因素「才盡」？二者實有區別，似乎不可混爲一談。按齊梁人所見鮑照詩文已亡佚大半，以現存資料而論，鮑照多數職官出任年期和詩文撰作時間又不易確定，大概會認爲沈約也只得含糊其辭，何況他已比虞炎未置可否更勝一籌了。然而，沈約在齊梁文壇地位甚高，如上引述鮑照詩文之例，沈約是否略而不察？而沈約若據鍾嶸所言其詩風深受鮑照影響，鮑照任中書舍人時果眞「爲文多鄙言累句」，是否未遑深究？《詩品》中「左光祿沈約詩」條云：

> 觀休文眾製，五言最優。詳其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閑經綸，而長於清怨。永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之。約於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極故微，[23] 故約稱獨步。[24] 雖文不至，其工麗亦一時之選也。見重閭里，誦詠成音。嶸謂約所著既多，今翦除淫雜，收其精要，允爲中品之第矣。故當詞密於范，意淺於江也。

[22]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1991 年 10 月），頁 775 ；錢仲聯：《鮑參軍集注》，頁 392-394 。

[23] 王師叔岷云：「『故』猶『尚』也。」詳見《鍾嶸詩品箋證稿》，頁 313 。

[24] 「約於時」以下六句文字，版本頗有異同，詳參王師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頁 312 、 313 ；曹旭：《詩品集注》，頁 322 、 323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鍾嶸言沈約詩取法鮑照，根據的理由之一是「察其餘論」，亦即鍾嶸乃是通過沈約之論鮑照，而進行的推斷。有關沈約詩文評的文論資料不少，[25] 較爲直接關聯到鮑照的評論，主要是《宋書》。按劉宋當時給予鮑照的負面批評有兩種，即是「休鮑」論和「才盡」說，沈約既否定鮑照「才盡」之說，又曾論及鮑照、惠休詩風，沈約這方面的論點，應是鍾嶸的推論依據。沈約言曰：

> ‧鮑照，字明遠，文辭贍逸，嘗爲古樂府，文甚遒麗。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美瑞，照爲〈河清頌〉，其序甚工。其辭曰：「……」世祖以照爲中書舍人。上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頊爲荊州，照爲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子頊敗，爲亂兵所殺。（《宋書‧卷五十一臨川王劉義慶傳附鮑照傳》）。
>
> ‧時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辭采綺豔，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宋書‧卷七十一徐湛之傳》）

沈約言惠休「辭采綺豔」，鮑照「文辭贍逸」、「古樂府，文甚遒麗」。顯著的差異是，沈約特別稱揚鮑照「古樂府」詩，言其修辭風格勁健華麗；以現存作品而言，鮑照樂府詩以擬古樂府數量最多，沈約應認爲鮑照詩最有特色的是這部分作品。至於概括性評語，可能涵蓋詩文而言，「綺豔」與「贍逸」亦略有區別，前者言其偏重追求修辭之美感，後者強調其辭意豐富語言甚有節奏。據《詩品》評沈約詩「工麗亦一時之選」，特言其「麗」，而沈約言惠休「綺豔」、鮑照古樂府「遒麗」，「麗」、「綺」、「豔」作形容詞義頗相近，將其疊合連稱用於批評，「綺豔」應指其詞藻過於華美，語帶貶抑，相對而言，「工麗」、「遒麗」則有稱揚之意；故鍾嶸應是就沈約評休鮑詩之取向，以論沈約的詩風，亦即評論之中表現出詩評家在感覺和認知上對所評作品的介入，而身兼創作者的詩評家又輾轉將其藝術感知反映或折射在自己作品中，鍾嶸判

[25] 參見郁沅、張明高編選：《魏晉南北朝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10月），頁296-304，此經選擇，實不僅此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斷沈約詩「憲章鮑明遠」，應是基於這樣的觀點，從沈約對鮑照之肯定而作出的推論。若對照《詩品》評鮑照、顏延之條，沈詩「工麗」可說僅得鮑照詩風特色之一端，「不閑經綸」可說不如顏延之「文雅」，又言其「淫雜」，似已將沈約歸於附從鮑照「言險俗者」一類。

鍾嶸與沈約的論詩觀點及評價體系頗多差異，[26] 沈約詩風是否片面取法於鮑照，或另有淵源，[27] 鍾嶸是否過於貶低沈約，此暫且不論。若比較沈約與鍾嶸對休鮑詩的評論，《詩品》經由與張協、張華、謝混、顏延之的對比，似乎較能揭示鮑照詩風的多樣特質，直言其獨樹一幟於晉宋兩代，更是特別抬高鮑照詩的文學地位；鍾嶸能夠給予鮑照如此高度評價，在理論上說，主要又以廓清顏延之「休鮑」論的迷障爲前提，故其論述亦遂顯得合理而周圓。相對地，沈約《宋書》成書在《詩品》前，從其敘述鮑照仕歷不如虞炎序具體完整來看，《宋書》撰成之際，沈約可能尚未見到虞炎編輯的《鮑照集》，因此當其否定鮑照「才盡」說之時，若因所見詩文有限，未便深究「爲文多鄙言累句」的問題，亦情有可原。總之，《詩品》之論述後出轉精，卻也不能埋沒沈約對鮑照詩評價的提高所作的貢獻，一是斷然否定鮑照「才盡」之說，其行文所述足以顯示鮑照即使「爲文多鄙言累句」，宜當歸因於外在情勢，即迫於孝武帝的政治權威。二是指出鮑照「古樂府，文甚遒麗」，這是最早針對鮑照最有特色的詩歌體裁之批評。三是採用「贍逸」、「遒麗」概括鮑照風格，而言惠休「綺豔」，雖已有高下之別，然尚未能如《詩品》明確區隔兩人詩風之異，但沈約用「逸」字、「遒」字形容，實有卓識，爾後杜甫言「俊逸鮑參軍」，[28]

---

[26] 詳參李錫鎮：〈試論鍾嶸《詩品》與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的對立關係〉，見《第三屆中國詩學會議論文集——魏晉南北朝詩學》（彰化師大國文系編印，1996 年 5 月），頁 363-419 。

[27] 清・陳祚明認爲沈約「詩體全宗康樂」，批評鍾嶸「謬厥源流」。見《采菽堂古詩選》，收於《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3 月），册 1519 ，頁 227 ；並參曹旭：《詩品集注》，頁 325 ，注引許文雨說。

[28] 語見〈春日憶李白〉詩，楊倫：《杜詩鏡銓》（臺北：華正書局，1976 年 6 月），頁 177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或可能是源出《宋書》；若與虞炎評語相較，虞炎言鮑照「雖乏精典，而有超麗」，可說全然專注於「麗」，抑揚之間，其評論觀點似乎猶未擺脫「休鮑」論的影響，沈約指出鮑照「遒」、「逸」的一面，顯然已意識到其風格的獨特，而爲廓清「休鮑」論問題跨出重要的一步。

沈約《宋書》之後，《詩品》成書前，蕭子顯的《南齊書》論及五言詩的流變和發展，並陳述齊梁詩歌創作流行的三種風格體式，其中亦提及惠休與鮑照。其言曰：

> 五言之製，獨秀眾品。習玩爲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竝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南齊書・卷五十二文學傳論》）

蕭子顯從讀者喜新厭舊、作家風格競爭兩方面，提出「新變」的文學發展觀點；認爲社會風尚不同，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個人體性有別，作家遂有風格之異。關於劉宋時期的詩壇，「顏、謝竝起」，「休、鮑後出」，言其先後引領風騷，成爲詩歌創作時尚所歸的人物；此處所述五言詩發展的歷史過程，乃是事實陳述，可與《詩品》互證。若體察文意，蕭子顯其實重在揭示齊名當時的惠休、鮑照，個人詩風卻大異其趣，略由「機、岳之文永異」、「乃各擅奇」、「不相祖述」等語，亦可見其立論要點。[29] 蕭子顯對惠休、鮑照詩風沒有具體說明，但已明確指出其各自成體，因此對於引起詩風之辨識產生混淆的「休鮑」論，蕭子顯應不會認同。

蕭子顯歸納出齊梁時人詩歌創作的風格體式有三種，論曰：

> 今之文章，作者雖眾，總而爲論，略有三體：一則啓心閑繹，託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疎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

[29] 參王運熙、楊明：《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6 月），頁 315 、 316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覩事例，頓失清采。此則傅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雅鄭。斯鮑照之遺烈也。（同上）

蕭子顯區分「三體」，主要是從當時詩歌創作的語言表現方式，歸納篇章呈現的風格形態，並追溯其風格來源，故論及辭藻、典故、句法結構的運用問題，在此不擬細論。值得留意的是，溯源的「三體」之中，只提鮑照，而未言及惠休，不免令人懷疑，惠休詩在齊梁時期是否仍如鮑照一樣深受重視？其次，「三體」之溯源，其所論述的作品表現樣態，乃是齊梁後學之所為，批評的對象主要是齊梁人，並非意在評論其所取法的前代作者；然而後學作品的流弊，若說是濫觴於前代作者，那麼牽涉詩歌評價的功過歸屬問題，又將如何劃分？[30] 這兩項疑點，皆與鮑照詩的評價問題相關聯，以下試由蕭子顯的批評展開討論。

蕭子顯對齊梁「三體」詩歌作品的批評，是褒貶互見的。[31] 略以出自謝靈運的一體而論，其貶義性評語是「終致迂回」、「疎慢闡緩」、「酷不入情」；若說齊梁作品的缺點濫觴於謝靈運，謝詩既已被公認為名家之作，則應是瑕不掩瑜，作品的缺失只能是局部的，且無論對他人寫作是否產生不良影響，都要受到批評家的公評，而不利其評價。當然，此非蕭子顯論述重點，而且也未說謝詩不可學。明言謝詩不可學的，在蕭子顯之前後，則有齊高帝蕭道成、梁太子蕭綱，史載：

> ‧武陵昭王曄……與諸王共作短句，以呈上（蕭道成），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辨首尾，安仁、士衡深可

[30] 王運熙、楊明云：「蕭子顯雖說此體『出靈運而成』，但主要不是批評謝靈運本人，而是批評學謝不得其精華，卻發展了謝詩某些短處的效顰者。『顏謝竝起，乃各擅奇』，他對謝靈運本人還是充分肯定的。」同上註，頁 317 。此一解說甚為適切，本文據此更作申述。

[31] 同註 29 ，頁 317 、 318 。又陳橋生認為對一、二類貶抑較重，對第三類較為肯定和寬容，見《劉宋詩歌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2007 年 3 月），頁 225 、 226 。其說待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南齊書・卷三十五武陵昭王蕭曄傳》）

・時太子（蕭綱）與湘東王（蕭繹）書，論之曰：「……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梁書・卷四十九文學傳庾肩吾傳》）

這兩則均論及謝詩的優劣處，並點明何者不可學。至於鍾嶸評謝詩，論其風格特色頗爲具體，且也言其疵病所在，但絕口不提當時學謝者之流弊。《詩品》上「宋臨川內史謝靈運詩」條云：

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爲累。嶸謂：若人興多才高，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曲新聲，絡繹奔發。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

鍾嶸指出謝詩「頗以繁蕪爲累」，此一缺點自是涉及作品語言表現形式問題，其指謂內涵或可與前述蕭道成、蕭子顯、蕭綱評語同參，暫不具論。若細察品評行文，針對此一詩病疵累，先是由「興多才高」來解釋其何以「繁富」，又用譬喻性評語闡明謝詩即使有缺點，仍然「未足貶其高潔」，頗可清楚感受鍾嶸極力爲其開解，迴護之意似甚顯著。《詩品》列謝詩上品，稱「謝客爲元嘉之雄」，[32] 此外宋齊梁詩人再無列名上品，則鍾嶸用心良苦，亦可推知。

若通過《詩品》評謝靈運，考察鍾嶸之品評鮑照，似乎不能不懷疑可能有欠公允。如上所述，謝詩「頗以繁蕪爲累」，鮑詩「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缺點雖然有異，其爲瑕累則相同；若說因爲「言險俗者，多以附照」，鮑詩對齊梁詩歌有不良影響，而蕭子顯等也已指出謝詩同樣也有負面作用，鍾嶸竟然避而不談，對謝詩缺點又是極力美言，如此看來，豈無偏頗之處？考察鍾嶸

[32] 語見〈詩品序〉，曹旭：《詩品集注》，頁 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未將鮑照列於上品，因素似乎並不單純，亦即不僅是有鑑於鮑詩對齊梁詩歌創作的負面作用而已，尚牽涉到更爲複雜的批評問題。《詩品・序》云：

> 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

《詩品》是部具有時評性的論詩之作，這段文字見於鍾嶸敘述其撰作動機的脈絡中。一則表達對齊梁人之過度推崇鮑照、謝朓詩甚不以爲然，一則又批評這些後學所作詩篇難以企及前輩詩人，字面意義明顯易曉。唯用「輕薄之徒」稱呼齊梁之後學，若是不學無術抑或名不見經傳的無知小輩，實不值一哂，大可不必重視，故鍾嶸指稱的應是在其當世的知名人士，而其評論必已流傳而引起普遍回響。按《南齊書・謝朓傳》載，沈約曾讚揚謝朓五言詩，聲稱「二百年來無此詩」；又察《詩品》論詩源出鮑照者，唯見沈約，鍾嶸依據沈約詩及其論述，推斷其「憲章鮑明遠」，而沈約詩學理論與詩歌史觀和鍾嶸大多針鋒相對，故此處批評「輕薄之徒」，對古今詩人抑揚過當，極可能在暗諷沈約。[33] 當然，取法鮑照或謝朓的齊梁人，絕非只有沈約，如「劣得『黃鳥度青枝』」的作者，則是曾經編輯《鮑照集》的虞炎。[34] 若將討論聚焦於鮑照，據《南齊書・文學傳論》與《詩品・序》記載，鮑照詩在齊梁已成爲當時詩歌取法的對象之一，甚且在齊梁也曾獲得極爲高度的推崇，卻反而招致鍾嶸的批評，因此，鮑照的文學聲譽或鮑詩受重視的程度，應該已經超越了湯惠休；《詩品》之後，蕭統《文選》鮑照與顏延之各選詩十八首，而未選惠休詩，徐陵《玉臺新詠》亦未選惠休詩，鮑照詩則多首被選，[35] 似可反映休鮑在齊梁人心目中的

[33] 同上註，頁 59 、 60 。案引《梁書・謝朓傳》，當作《南齊書》，應是筆誤。

[34] 同上註，頁 60 、 61 ；並參王師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頁 84 、 85 。

[35] 參見蕭統：《文選》，在此不擬一一注明。《玉臺新詠》徐陵原本的具體篇目，今已無從考索；現存版本多種，其中有宋、明人再選入的作品。詳參劉躍進：《玉臺新詠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2000 年 7 月），頁 3-64 、頁 89-151 。今據清吳兆宜將明人增入者排除在外，惠休未選，選鮑照詩十七首，見《玉臺新詠箋注》（北京：中華書局， 1992 年 9 月），此不擬一一注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地位。

鍾嶸反對齊梁「輕薄之徒」褒揚鮑照、謝朓，貶抑曹植、劉楨，其詩歌史觀轉爲崇古卑今，從《詩品》中可見推崇建安時期詩歌，曹、劉、王粲皆列上品，又因其詩歌理論之反對繁用典故，亦將劉宋元嘉初期與謝靈運齊名的顏延之列於中品，於是南朝時代除謝靈運外無人列入上品，分品論詩正是藉以彰顯其評價觀點。謝靈運與鮑照詩均有其缺點，也都對齊梁詩歌有不良影響，鍾嶸未將鮑詩列入上品是否欠缺公允？按照鍾嶸的立場來思考，或許其尚有考慮謝、鮑詩缺點的輕重程度及其影響層面的不同。爲求辨明其意，宜再作引述：

> 蕭子顯：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艷，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雅鄭。斯鮑照之遺烈也。
>
> 鍾　嶸：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

蕭子顯重在議論出自鮑照的齊梁後學詩風，鍾嶸較偏重言鮑詩缺點，此略有差別。兩則評語相同的字詞，是「調」、「險」、「雅」，「調」字是借自音樂的比喻性用語，「雅」涉及文化理念或審美觀點，「險」字是描述性的形容詞，詞義暗含價值判斷。蕭子顯對齊梁後學詩風的描述較爲具體，包括詩篇發端部分、句法變換、修辭方式，兼及詩篇局部和整體的閱讀效果，「險」字、「淫」字已隱含其負面批評，故最後兩句以類比評論，可用「俗」字概括。鍾嶸論鮑照詩的缺點，其描述相對較爲含混，「危仄」可能兼含修辭與句法，因「調」字借自音樂用語，涉及曲調相關的節奏和旋律，宜從語句方面來體會，而「言險俗者」的「言」字，應是指向詩歌語言表現方式的問題。鍾嶸未說明「言險俗者」的詩歌語言表現情況，此或可藉蕭子顯的評論，由出自鮑照一體的齊梁詩風加以揣測；而鍾嶸論鮑詩缺點，針對的是因「貴尚巧似」，爲求形似逼眞而出現修辭或句法上的瑕疵，批評對象實有分別，不宜混同。值得留意的是，儘管蕭子顯、鍾嶸批評的對象並非相同，觀點卻頗爲一致，大抵都是從語詞的運用和句法結構的形式特徵進行評論，所給予的負面評價，也都可用「言險俗」一語概括；而其所以遭受低貶，簡言之，就是牽涉「雅」、「俗」之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蕭子顯、鍾嶸的評論，流露出崇雅卑俗的傾向，若考察《詩品》的批評，鍾嶸尤其明顯。其言曰：

- 頗似魏文。過爲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詩品》中「魏中散嵇康詩」條）
- 祖襲魏文。善爲古語，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詩人激刺之旨。……（《詩品》中「魏侍中應璩詩」條）
- ……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秀逸，固是經綸文雅才；才減若人，則蹈於困躓矣。……（《詩品》中「宋光祿大夫顏延之」條）
- 檀、謝七君，並祖襲顏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詩品》下「齊黃門謝超宗」等條）
- ……善銓事理，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故擢居中品。……（《詩品》中「梁太常任昉詩」條）
- 希逸詩，氣候清雅，不逮王（微）、袁（淑）。然興屬閒長，良無鄙促也。（《詩品》下「宋光祿謝莊」條）
- 欣泰、子眞，並希古勝文，鄙薄俗製，賞心流亮，不失雅宗。（《詩品》下「齊雍州刺史張欣泰、梁中書郎范縝」條）

以上七例，可以看出鍾嶸是據雅俗之辨作爲詩歌審美判斷和評價的一項標準。雅者，正也，又往往與「古」相應，[36] 即涉及社會體制和文化傳統，故大致而言，凡符合成規或慣例的言語行爲方式即是「雅」，反之則爲「俗」，此即荀子所謂「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37] 鍾嶸崇雅卑俗，可由其評張欣泰、范縝的語彙「雅宗」與「俗製」對舉，見出截然二分的評價觀點；「雅宗」意指詩風符合雅正的傳統，[38] 如應璩詩受到其稱美即因採用《詩三百》的諷諭手法。而同樣用「淵雅」一詞爲評，

36 參王師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頁 404 。

37 語見《荀子・修身篇》；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 1992 年 2 月），頁 23 。

38 參曹旭：《詩品集注》，頁 466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嵇康與任昉抑揚有別，即以表情達意或敘事說理的方式是否得體來判斷。至於這種被視爲符合雅正傳統的詩風，在鍾嶸看來應是屬於有涵養的知識階層之藝術品味，因此雖不滿意顏延之繁用典故，卻又稱其「固是經綸文雅才」，取法顏延之者則稱許其「得士大夫之雅致」，也因任昉「得國士之風」而特別列之中品。

鍾嶸依據雅俗之辨進行審美判斷和詩歌評價，就有上述諸多例子，亦可見其崇雅卑俗觀念之堅持。那麼鮑詩有其缺點，況且對齊梁詩風又有不良影響，即使已讚其「總四家之美，跨兩代而孤出」，而未將之列於上品，又有何不可？倘若如此，鍾嶸對鮑詩的評價，似乎有其正當性，蓋因其所秉持的是傳統詩歌美學重雅輕俗的評價標準；然而傳統標準是否不可移易？其來有自的文化慣例或社會成規是否爲一成不變？以中國古代美學而言，歷來文論除了崇雅卑俗，另有不俗不雅、化俗爲雅、以俗爲雅、重俗輕雅等多種主張，衆說紛紜；[39] 蓋因作品的表現形式會有所創新，絕非墨守成規，面對不同於雅正詩風的作品，批評家或許要重新製定評論的準則，方可揭示不同風格的作品之價值。[40] 因此，若從這個角度思考，則鍾嶸因崇雅卑俗而未能給予鮑照更高的評價，適當與否，似乎仍可再議。

三、辨《玉臺新詠》誤導鮑照詩的評價與風格判斷

南朝文史資料中，有關此一時期評論鮑照詩的諸種說法，略由以上討論，或許較能明其曲折原委，而可有整體性的理解。以此爲基礎，我們再來考察與

[39] 詳見曹順慶、李天道：《雅論與雅俗之辨》（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5 年 11 月）。

[40] （英）貢布里希說：「不同的風格與不同的競賽相類似，都有自己衡量成功的尺度，……藝術不是一種具有固定規則的競賽，而是在前進當中製定規則。」見貢布里希（E.H.Gombrich）著，范景中等譯：《理想與偶像——價值在歷史和藝術中的地位》（*Ideas and Idols: Essays on values and in art*）（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9 年 7 月），頁 254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玉臺新詠》理解相關的鮑照詩負面批評。若仔細分辨，可以發現其論點仍與南朝文論家的若干見解彼此關聯，雖然只是簡要論斷，但論題已有拓展，故須加以重視。

清代馮班，指出宮體詩的始作俑者，是鮑照和沈約，言曰：

> 《國風》好色而不淫，《楚辭》美人以喻君子。五言既興，義同《詩》、《騷》，雖男女歡娛幽怨之作，未極淫放，《玉臺新咏》所載可見。至於沈（約）、鮑（照），文體傾側，宮體滔滔，作俑于此。永明、天監之際，鮑體獨行，延之、康樂微矣。嚴滄浪于康樂之後不言延之，又不言沈（約）、謝（朓），則齊、梁聲病之體，不知所始矣；不言鮑明遠，則宮體紅紫之文，不知其所法矣。雖言徐（陵）、庾（信），亦忘祖也。[41]

馮班這段話語，主要在批評宋嚴羽《滄浪詩話》，其言齊、梁聲病的部分，暫且不論。馮班將沈約、鮑照並論，從其詩歌內容方面述及男女歡娛幽怨之情，過於「淫放」，認定宮體詩淵源於此；又指稱齊梁之時「鮑體獨行」，影響當時詩風，宮體詩乃是取法於鮑照，似已將其視爲罪魁禍首。《詩品》言沈約詩「憲章鮑明遠」，沈約似可稍減罪責；唯言齊梁之時「鮑體獨行」，應與事實不符，據蕭子顯、蕭綱等人所述，當時風行的至少尚有謝靈運詩。

考察馮班論斷沈、鮑與宮體詩的關係，應是根據《玉臺新詠》所作的推測，按現今通行的吳兆宜箋注本來看，徐陵編選之時，已經作古的歷代詩人中，收錄詩歌數量最多者是沈約，計四十三首，宋刻本不收者六首除外，亦有三十七首；其次鮑照，計二十首，宋刻本不收者除外，則有十七首。[42]應當思考的是，《玉臺新詠》收錄沈約、鮑照詩特多，是否可據此推定宮體詩的產生即與他們有直接關聯？[43]抑或二人被選錄的作品即是宮體詩？按詩有所謂「宮

---

41 馮班語，見吳喬：《圍爐詩話・卷之二》，收於郭紹虞編選：《清詩話續編》（臺北：木鐸出版社， 1983 年 12 月），頁 522 。

42 詳見吳兆宜：《玉臺新詠箋注》。

43 石觀海討論宮體詩的歷史發展，即將惠休、鮑照、鮑令暉等歸於宮體詩發軔期，並言《玉臺新詠》所選鮑照詩主題「險俗」，風格綺麗，影響永明詩人謝朓、沈約。見《宮體詩派研究》（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3 年 8 月），頁 104-122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體」一類，「宮」指皇太子所居的東宮，「宮體」詩之名，不會早於梁武帝中大通三年 (531) 之前，此一詩體的倡導人物之一蕭綱，即在這年七月繼蕭統卒後任太子，移居東宮則在隔年九月，直至太清三年 (549) 五月。[44] 關於宮體詩的形成及其體式內容，史書載曰：

- 徐摛……幼而好學，及長，遍覽經史。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會晉安王綱出戍石頭，……以摛為侍讀。……王入為皇太子，轉家令，兼掌管記，尋帶領直。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高祖聞之，怒，召摛加讓，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高祖意釋。（《梁書・卷三十徐摛傳》）
- 梁簡文（蕭綱）之在東宮，亦好篇什，清辭巧製，止乎衽席之間，雕琢蔓藻，思極閨闈之內。後生好事，遞相放習，朝野紛紛，號為「宮體」。流宕不已，訖于喪亡。陳氏因之，未能全變。（《隋書・卷三十五經籍志四》）

據此可知，宮體詩的形成，主要是由徐陵之父徐摛所引領的一種新變詩風。徐摛自梁武帝天監八年 (509) 隨蕭綱戍石頭，直至中大通三年均為其僚屬，[45] 這種新變詩風應是在其府署先已流傳，並產生影響，只是有「宮體」之名須待蕭綱為太子之時。[46] 宮體詩的流傳，是由蕭綱的東宮傳遍朝野，梁亡後又傳至陳。關於宮體詩的語言形式和表現內容，可概括為「清辭巧製，止乎衽席之間，雕琢蔓藻，思極閨闈之內」，即詞彙清新、修辭華麗、句法鋪陳，題材則與女性有關。史傳言徐摛「好為新變，不拘舊體」，又言東宮中人所以會學習仿效，是因「摛文體既別」，可推宮體詩應該是種新體詩，已與當時出自鮑照一體的詩風有極大的差異，故宮體詩的形成似與鮑照詩無直接關係。而沈約提

44 見《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11 月），頁 75 、 104 。

45 同上註，頁 103 、 447 。

46 參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年 12 月），頁 238 、 239 ；《中古文學史料叢考》，頁 588 、 589 。胡大雷：《宮體詩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年 11 月），頁 1 、 2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倡聲律說，永明體即屬新變詩風，沈約與宮體詩的形成，關係應較密切。

若說宮體詩是天監八年之後逐漸形成的一種新體詩，當時熱衷跟隨的應是蕭綱、徐摛、庾肩吾等人的詩風，何以會將鮑照、沈約與宮體詩牽扯上關係？此一問題牽涉頗廣，涉及《玉臺新詠》的編者何以不是徐摛，而是徐陵？此書編撰動機及目的，是否誠如序文所述純爲因應後宮婦女排遣寂寞生活的閱讀之用？抑或另有更爲接近事實的成因？關於這方面的討論，現代學者頗重新檢視唐代劉肅《大唐新語》的一則敘事，而有極爲具體的研究成果。在此不煩詳述，以下撮其大要，並就本文論題相關者更作辨析。按劉肅記載云：

> 太宗謂侍臣曰：「朕戲作艷詩。」虞世南便諫曰：「聖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而今而後，請不奉詔。」太宗曰：「卿懇誠如此，朕用嘉之。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乃賜絹五十疋。先是，梁簡文帝爲太子，好作艷詩，境內化之，浸以成俗，謂之宮體。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永興之諫，頗因故事。（《大唐新語・卷之三公直》）

據學者考證，《玉臺新詠》編成的時間，應在中大通六年 (534) 左右，即蕭綱繼任太子初期，並非其「晚年」；中大通三年徐摛出任新安太守，乃令徐陵編輯。《玉臺新詠》最獨持的是大量選輯當時現存詩人的作品，尤其太子蕭綱、湘東王蕭繹集團者爲多，並選擇梁武帝以下者陪襯，再選取歷代若干與艷詩有關的作品，以構成全書；其目的乃在宣揚蕭綱的文學觀念，擴大宮體詩的範圍和影響。[47] 如此解釋蕭綱「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頗可說明《玉臺新詠》的編撰動機及目的，然而除此之外，是否還有別的因素？何以編者徐陵尚且自選其詩，而其父徐摛竟全然未選？[48]

[47] 詳參（日）興膳宏著、彭恩華譯〈《玉臺新詠》成書考〉一文，見《六朝文學論稿》（長沙：岳麓書社， 1986 年 6 月），頁 329-350 ；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學史》，頁 269-273 。又劉躍進從不同版本所選之詩篇，反駁書成於中大通六年說，見《玉臺新詠研究》，頁 65-87 。唯因此書徐陵原本具體篇目，今已無從考察，故暫不採其說。

[48] 參劉躍進：《玉臺新詠研究》，頁 82 、 83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按史料所述，徐摛與宮體詩的形成可說關係極爲密切，即使非開創者，也應是宮體詩派的健將，《玉臺新詠》未選徐摛詩，似乎頗不尋常。據劉肅記載，「宮體」與「豔詩」之義幾乎相等，虞世南批評其「體制非雅」，從稱美唐太宗詩「工」，乃是指語言形式技巧而言，不雅而傷俗的應在題材內容方面，即「止乎衽席之間」、「思極閨闈之內」；這類與女性相關的題材，在傳統社會禮教的道德氛圍中，是與強調好德不好色的觀念相衝突的。因此，中大通三年，當這類新變的豔詩正式賦予「宮體」之號，梁武帝怒而召見徐摛，可能即因這類豔詩竟以「宮體」爲名，而有違禮敗俗之虞，其意或與虞世南之勸諫的觀點類似。儘管徐摛並未受到梁武帝責怪，唯此事卻也是間接導致其離開東宮而出任外郡的原因。《梁書・徐摛傳》續云：

> 高祖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說，末論釋教。摛商較縱橫，應答如響，高祖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異日隆。領軍朱异不悅，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逼我，須早爲之所。」遂承間白高祖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以自怡養。」高祖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爲之，卿爲我臥治此郡。」中大通三年，遂出爲新安大守。至郡，爲治清靜，教民禮義，期月之中，風俗便改。秩滿，還爲中庶子，加戎昭將軍。

中大通三年七月蕭綱立爲太子，此後詩有「宮體」之名，梁武帝因此怒召徐摛，徐摛獲寵而受朱异排擠，外放新安太守，一連串事件皆發生在此年數月之間。對年已六十一歲的徐摛而言，[49] 其內心世界大概不會平如止水毫無感受；因而無論徐陵編撰《玉臺新詠》是否完成於中大通六年，此書未選徐摛詩，應是出自其父旨意，而《玉臺新詠》的編撰體例，或許也含有徐摛提供的意見。梁武帝怒召徐摛，徐摛雖未被怪罪，若因「宮體」是種豔詩，其題材內容有違禮敗俗之虞，則《玉臺新詠》除選輯蕭綱文學集團的詩人作品外，並擴大範

[49] 據蕭繹在中大通六年（534）撰〈法寶聯璧序〉，徐摛自署「年六十四」推算，當生於宋明帝泰始七年（471）。參見徐逸民：〈徐陵年譜〉，《徐陵集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8 月），頁 168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圍，旁及當代且追溯歷來詩人題材相關的作品，正可藉以淡化道德方面的顧忌，並賦予宮體詩合理化或正當性。《玉臺新詠》未選徐摛詩，反而可以突顯編撰此書含有頗多隱情。

如上所述，《玉臺新詠》的編撰動機及目的頗不單純，對其可能存在因素若已有所理解，就較能確認此書的性質，尤其更可明白何以所選的古人詩，其實題材內容並非豔詩，而竟也入選。清許槤評論《玉臺新詠》，云：

> 是書所錄為梁以前詩，凡五言八卷，七言一卷，五言二韻一卷。雖皆綺麗之作，尚不失溫柔敦厚之旨，未可概以淫豔斥之。或以選錄多閨閣之詩，則是未睹本書，而妄為擬議者矣。（《六朝文絜・卷八玉臺新詠序》評語）

這則評語極為精警，對此書所選「梁以前詩」的形式與內容所作的評論，應當是將之與入梁以後的作品加以對比；前者「綺麗」、不失詩教，後者「淫豔」，有失溫柔敦厚。依許槤觀點來看，入選的鮑照與沈約詩是不容混為一談的，馮班似有「妄為擬議」之病。最早從編選者的動機，非議《玉臺新詠》選「古人之作」有其缺失的是梁啓超，他說：

> 《新詠》為孝穆承梁簡文意旨所編，目的在專提倡一種詩風，即所謂言情綺靡之作是也。其風格固卑卑不足道，其甄錄古人之作，尤不免強彼以就我。雖然，能成一家言。欲觀六代哀艷之作及其淵源所自，必於是焉。故雖漏略，而不為病。[50]

「梁以前詩」即屬於「古人之作」；所謂「強彼以就我」，即依編輯者的目的，勉強地將風格並非「卑卑不足道」的古人作品選入此書。梁啓超先生的話語頗有意味，唯須強調的是，讀者若欲透過《玉臺新詠》去逆溯宮體詩的源流之時，須先瞭解編者是以「強彼以就我」的動機或目的為前提；否則讀者考鏡源流之際，容易發生混淆端委始末，而將宮體詩的流弊歸罪於「古人之作」，

[50] 梁啓超先生序跋語，見吳兆宜：《玉臺新詠箋注》，頁 551；附錄，乃中華書局編輯室所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如馮班之苛責鮑照，即屬此例。

徐陵編《玉臺新詠》，其序文云：

> 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篇章，無由披覽。於是，燃脂暝寫，弄筆晨書，撰錄豔歌，凡爲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

序文聲稱，編集的用意是爲方便讀者閱讀的需要，免除勞倦尋覓之苦，[51] 並言選錄的古今作品均屬「豔歌」，強謂凡所選輯的詩人作品皆屬佳構，與《詩經》中〈雅〉〈頌〉及其作者比較，亦不相上下，編輯者絕非濫選，而良莠不分。序文之中，省略不言可能更爲眞實的複雜動機或目的。若僅據這段文字，不明究理的讀者，確實容易被誤導，淆亂了「往世名篇」和「當今巧製」的差別，誤以爲舉凡此書所選的都是「豔歌」。倘若序文易於誤導讀者，則不免要懷疑編輯者的用心。蓋因讀者閱讀前的期望視野，易受序文的論點影響或干擾，從「豔歌」的觀察角度切入作品，而促成錯誤的讀解；唯當讀者乂按序文提示，進而與文學典範《詩經》相比，將會感覺這些「豔歌」欠缺了比興諷諭的成分，結果即是難以避免厚誣古人。馮班讀過《玉臺新詠》，而據《詩》、《騷》比興傳統來批評徐陵所選的鮑照詩，雖也追溯源流，卻疾言厲色苛責鮑照，應當就是依循序文而作如此的讀解。

許槤言「梁以前詩」，「未可概以淫豔斥之」，學者亦曾列舉《玉臺新詠》所選詩，如〈漢時童謠歌〉、阮籍〈詠懷〉、左思〈嬌女〉、李充〈嘲友人〉、陶淵明〈擬古〉，都不屬於「豔情」之列；[52] 以左思〈嬌女〉爲例，作者鋪敘的是兩個稚齡女兒嬌憨的情態與舉止，若因其寫女性而入選，豈不荒唐？故此書之選詩標準，實大有可議之處，今僅就其所選鮑照詩爲說。《玉臺新詠》選鮑照詩二十首，宋刻本未收者三首不計，亦有十七首，馮班或因其獲選作品數量甚多，而怪罪鮑照爲始作俑者，今列舉十七首詩篇目，卷四收五言

[51] 參胡大雷：《宮體詩研究》，頁 234 。

[52] 見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學史》，頁 271 。唯未說明原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九首：〈翫月城西門〉、〈代京洛篇〉、〈擬樂府白頭吟〉、〈採桑詩〉、〈夢還詩〉、〈擬古〉、〈詠雙燕〉、〈贈故人馬子喬二首〉；卷九收七言爲主兼有雜言者八首：〈代淮南王二首〉、〈代白紵歌辭二首〉、〈行路難四首〉。[53]

本文限於篇幅，難以逐篇討論，略作概說。一是〈翫月城西門〉與〈擬樂府白頭吟〉在蕭統《文選》已曾入選，前一首詩是鮑照寫於秣陵令時，本文之前已略有討論，此詩主題在描寫賞月情景，若以「蛾眉」形容弦月，或詩末句「留酌待情人」是涉及女性而入選，則顯然爲曲解，[54] 徐陵似是誤選；再以蕭統評陶淵明「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參照，[55] 陶淵明仿擬前代賦篇描寫傾慕美女之情，即招致批評，倘若《文選》所選鮑照詩牽涉豔情，又豈能寬容？二是詩篇標題有「擬」、「代」字者有十一首，[56] 亦即這些詩篇皆爲仿擬之作，察其題材內容，[57] 如涉及棄婦自傷哀怨之情者，有〈代京洛篇〉、〈擬樂府白頭吟〉、〈代淮南王二首〉、〈行路難〉（剉檗染黃絲），共五首；言閨中思婦念遠之情者，有〈擬古〉（河畔草未黃）、〈行路難〉（中庭五株桃）、（璇閨玉墀上椒閣），共三首；描寫舞者之美，勸人及時行樂的，是〈代白紵歌辭二首〉。這十首擬作的三種題材，皆古已有之，並非新創；唯〈代白紵歌辭〉二首之內容，衛道者觀之，或可認爲即屬豔情。至於〈行路難〉（奉君金卮之美酒）一首，收受禮物者爲「君」是男性權貴，送禮者、歌者性別身分難辨，雖有及時行樂之意，觀其內容似是誤選。故十一首擬作，可

53 案篇題略與鮑照詩文集相異者，集作〈翫月城西門廨中〉、〈代陳思王京洛篇〉、〈代白頭吟〉、〈夢還鄉〉、〈代白紵曲〉、〈擬行路難〉。又〈擬古〉集有八首，此選其第七首；〈詠雙燕〉二首，選第一首；〈贈故人馬子喬〉六首，選第二、六首；〈擬行路難〉十八首，選第八、九、一、三，順序與集異。見錢仲聯：《鮑參軍集注》。

54 吳兆宜，引劉良注：「情人，友人之別離者。」見《玉臺新詠箋注》，頁 139 。

55 蕭統：〈陶淵明集序〉，見俞紹初：《昭明太子集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年 7 月），見 200 。

56 參見注 53 。

57 以下題材內容分析，參錢仲聯：《鮑參軍集注》，不擬一一注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稱爲屬於豔情詩者僅有二首。三是〈採桑詩〉，此詩爲相和歌辭相和曲，言春日女子採桑，歸後清歌，彈琴抒情，「承君郢中美，服義久已諾」二句，言琴藝深獲歎賞而盼恩義長存，琴瑟和鳴；詩中且非議鄭衛風俗浮豔澆薄，故情調纏綿，卻甚有古意，應非豔情之作。〈詠雙燕〉，詩題似詠物，內容則是託物抒情之作，轉折極有意趣，詩末「悲歌辭舊愛，銜淚覓新知」，似在況寫棄婦心思，有含意不盡之妙，亦與豔情無涉。四是〈夢還詩〉，描寫白日思鄉，夜中夢歸故鄉與妻會面情景，情意綿綿，「探袖解纓徽」一句，衛道者認爲鋪敘詳盡，流於輕慢；唯閨中夫妻旖旎之情，正可襯托夢醒之後，空虛悵惘，若有所失，轉生悲哀慷慨之情。此詩章法嚴謹，波折起伏，尤其是寫夢醒後的感覺意識和情緒變化狀態，意象最是生動，應屬佳構。〈贈故人馬子喬二首〉，前首寫知交久別後之感傷，後首言思念深切而盼望此生能再相見；修辭華麗，句法鋪排，化用典故，跌宕有致。唯由篇題可知是贈答詩，徐陵將兩首詩視爲「豔歌」而收錄，似乎不倫不類。

綜觀上述，《玉臺新詠》收錄鮑照詩十七首之中，雖有「歡娛幽怨之作」，然而語涉「淫放」的作品並不多，馮班爲「宮體」詩溯源，過度苛責鮑照，未免失察而言過其實；而徐陵對鮑照詩的選輯，亦不乏失之離譜的現象，故其選古人之作「強彼以就我」的情況，亦可見一斑。若據蕭子顯、鍾嶸所述，鮑照詩風行於齊梁之時，《玉臺新詠》大量收錄鮑照作品，應該是借重其文學聲望，而來爲宮體詩正名或壯大聲勢，然而卻使鮑照蒙受汙名，而淪於極爲不利其詩歌評價的處境。

馮班受徐陵《玉臺新詠》的誤導，將鮑照詩與「宮體」牽扯上關係，而「宮體」屬於「體制非雅」的「豔詩」、「豔歌」，非雅即俗，於是對鮑照詩的風格判斷，很容易似是而非地被化約爲「俗豔」、「淫豔」。而宋齊梁文史資料中，又不乏鮑照詩負面批評的論點，這些片面性的論斷又是被斷章取義地運用，遂彼此攀附聯結，構成一種對鮑照詩風甚爲偏頗的特徵描述。以下這則有關宮體詩的簡要論述，可以發現這些歧出錯雜的論斷或資料，被聯繫在一起的情形，劉師培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宮體之名，雖始于梁；然側豔之詞，起源自昔。晉、宋樂府，如〈桃葉歌〉、〈碧玉歌〉、〈白紵詞〉、〈白銅鞮歌〉，均以淫豔哀音，被于江左。迄于蕭齊，流風益盛。（自注：《南史・袁廓之傳》謂：「時何僧亦稱才子，為文惠太子作〈楊叛兒歌〉，辭甚側麗。廓之諫曰：夫〈楊叛〉者，既非典雅，而聲甚哀。」亦其證。）其以此體施于五言詩者，亦始晉、宋之間，後有鮑照，（自注：明遠樂府，固妙絕一時，其五言詩亦多淫豔，特麗而能壯，與梁代之詩稍別。《齊書・文學傳論》謂：「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斯鮑照之遺烈。」其確證也。）前則惠休。（自注：綺麗之詩，自惠休始。《南史・顏延之傳》云：「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製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後生。』」即據側麗之詩言之。）特至于梁，其體尤昌。……（《中國中古文學史》）

劉師培先生此書年代極早，原爲教學講義，卻是開啓近現代研究六朝文論和文學史的重要論著，影響極爲深遠，[58] 故特爲提出。如這則引文，論及宮體與鮑照、惠休的關係，舉凡其所概括的論述與引證的資料，都被進一步推展或充實，可以說至今仍然主導現今學者研究的方向。因此顏延之的「休鮑」論深受重視，鮑詩「險俗」的說法也被提出，並相互結合成討論鮑照詩的風格和評價的預設性要件，[59] 或者將其作爲研究探討的議題。[60]

如果仔細辨察，其間仍有差異，劉師培的論點是直言鮑照詩，尤其特指其「五言詩」淫豔是受「宮體」影響，現今學者則對此略而不言。學者有可能是

---

58 見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論文雜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年 5 月），頁 143-146，〈校點後記〉。

59 如曹道衡：〈論鮑照詩的幾個問題〉，《中古文學史論文集》，頁 211-241。陳橋生：《劉宋詩歌研究》，頁 180-228。王志清：《晉宋樂府詩研究》，頁 262。

60 如鄺健行：〈論顏延之對鮑照的貶評〉，香港中文大學中語系主編：《魏晉南北朝文學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 11 月），頁 295-300。徐國榮：〈鮑照詩歌「險俗」釋證〉，《中國韻文學刊》1997 年第 2 期，頁 60-64。鍾濤：〈「休鮑」體發微〉，《雅與俗的跨越——漢魏六朝及元代文學論集》（成都：巴蜀書社，2001 年 3 月），頁 142-1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覺察「宮體」有名實問題，又知鮑照「五言詩」在《詩品》中似已有頗高評價，於是轉向討論鮑照、惠休詩風較相近的樂府詩，亦即那些修辭華麗、內容淺俗、情調較浪漫，風格類似吳歌西曲的作品；唯其如此，方可符合「側豔」、「側麗」、「淫豔」之實，又可與顏延之立「休鮑」論、鮑詩「險俗」說法扣聯。無可否認，今鮑照詩有〈秋日示休上人〉、〈答休上人〉，惠休則有〈贈鮑侍郎〉，兩人互有贈答詩，其間關係確實值得探索；唯惠休詩僅存十一首，數量太少，若牽聯顏延之「休鮑」論，或附會「險俗」之說，而將兩人詩風混爲一談，難免以偏概全，且必與現存南朝文史資料互爲抵觸。根據本文前述之討論，顏延之立「休鮑」論是刻意低貶鮑照，齊梁人對鮑照詩的評價也已遠高於惠休。無論蕭子顯批評出自鮑照一體的齊梁詩，或鍾嶸批評鮑詩的缺點，即使可用「險俗」一詞概括，也都屬於詩歌語言表現方面修辭或句法的問題，而非對詩篇之題材內容有所疵議。

至於有學者認爲鮑照詩「險俗」的作品，乃指其古樂府中不便入樂的七言或雜言詩，甚或指其撰寫風格近似吳歌西曲的作品。如果審愼思考，必須探問：蕭子顯用「淫豔」等語或鍾嶸用「危仄」、「險俗」批評，是否可能字面上雖是批評其修辭句法，其實是在非議這類體裁作品？按蕭子顯評論齊梁詩歌「三體」之後，自道其創作觀點，云：

> 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構聚。……雜以風謠，輕脣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胸懷。……（《南齊書・卷五十二文學傳論》）

據「雜以風謠」、「不雅不俗」二語，蕭子顯主張詩歌創作應融合民間歌謠的語言風格特點，要求詩歌語言須古雅與麗俗相結合，而加以折衷，[61] 故蕭子顯的觀念應當不會反對寫作樂府詩。又《玉臺新詠》選蕭子顯詩，含宋刻本不收者六首，共計十七首，題材內容均屬於豔歌。除〈詠苑中遊人詠〉外，皆爲樂府詩；七言樂府詩共八首，〈春別〉四首、〈烏棲曲〉三首、〈燕歌行〉一

[61] 參王運熙、楊明：《漢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頁 318 、 319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首。[62] 從蕭子顯本身詩歌作品來看，所撰作的多首七言樂府，風格均近似吳歌西曲，故絕不可能認爲這類作品淫豔或險俗。鍾嶸現今未有詩留存，據《詩品》所見資料判斷，應也不會反對寫這類體裁的詩歌，其言曰：

- 又工爲綺麗歌謠，風人第一。（《詩品》中「宋法曹參軍謝惠連詩」條）
- 吳善於風人答贈。許長於短句詠物。（《詩品》下「晉參軍毛伯成、宋朝請吳邁遠、齊朝請許瑤之」條）
- 行卿少年，甚擅風謠之美。（《詩品》下「梁步兵鮑行卿、梁晉陵令孫察」條）
- 康、帛二胡，亦有清句。〈行路難〉是東陽柴廓所造。寶月嘗憩其家，會廓亡，因竊而有之。廓子賚手本出都，欲訟此事，乃厚賂止之。（《詩品》下「齊惠休上人、齊道猷上人、齊釋寶月」條）

「歌謠」、「風謠」，指樂府民歌類作品，「風人」即謂歌謠或樂府詩作者。《詩品》專論五言詩，包括古詩與樂府，如前述言及鮑照「日中市朝滿」一句，即出自〈結客少年場行〉，虞炎「黃鳥度青枝」，見其樂府詩〈玉階怨〉。鍾嶸評論詩，自然先要統觀作家詩集或留存的所有作品，如評沈約言「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約所著既多，今剪除淫雜，收其精要，允爲中品之第」，沈約詩有多首三、五、七言和辭賦、騷體雜糅的作品，[63] 據評語可知鍾嶸雖評論五言詩，亦參照作者其他體製的詩作比較。評康寶月詩，敘述其竊取柴廓〈行路難〉事，乃在區辨作品歸屬，反映時人競相撰作，甚或不擇手段的現象。徐陵《玉臺新詠》、選〈行路難〉仍誤題爲寶月詩；[64] 此詩爲雜言體，七言句爲多，內容述及客子與思婦兩地相思之苦。鍾嶸提及這首詩，雖未言其體裁內容，顯然並不會加以排斥。《詩品》評謝惠連「工爲綺麗歌謠」、評吳邁遠「善於風人答贈」，雖未舉證其詩，而《玉臺新詠》選謝惠連雜詩三首：

62 見吳兆宜：《玉臺新詠箋注》，今不一一注出。
63 參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學史》，頁 176 、 177 。
64 參吳兆宜：《玉臺新詠箋注》，頁 415 、 416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七月七日詠牛女〉、〈擣衣〉、〈代古〉，吳邁遠擬樂府四首：〈飛來雙白鵠〉、〈陽春曲〉、〈長別離〉、〈長相思〉，[65]均爲五言，情調纏綿哀思，都是樂府歌謠體製，可以與《詩品》評論相印證。因此，蕭子顯評出自鮑照體的齊梁詩、鍾嶸論鮑照詩的缺點，主要都是從修辭句法批評其詩歌語言不夠優美文雅，可以說這是種偏重詩歌語言形式樣態的風格批評，而不雅而俗的判斷，應當不是根據作品的題材內容或體裁類型，其評價作品的觀點和立場，與馮班或劉師培的看法並不一致，實不宜混淆。

劉師培認爲宮體詩的「側豔之詞」，是源自晉宋樂府，而這種「淫豔哀音」也影響晉宋五言詩的寫作，惠休、鮑照詩的綺麗淫豔，即是如此一路相承，而在梁代形成宮體詩。此種論述，與馮班頗爲類似。[66]若按其所列舉的晉宋樂府詩篇題，檢索與「宮體」關係密切的《玉臺新詠》，可以發現此書卷十有孫綽〈情人碧玉歌〉二首、梁武帝一首，王獻之〈情人桃葉歌〉二首，沈約〈襄陽白銅鞮〉一首、梁武帝三首，卷九撰作〈白紵歌辭〉者有惠休、鮑照、沈約、張率、梁武帝，其篇數不一一列舉；卷九以七言爲主兼收雜言、卷十收錄五言四句小詩，這兩卷收錄自古至梁的作品，編輯體例與前八卷有異，[67]似乎較易溯源。劉師培的論述，顯然也如馮班都是經由《玉臺新詠》作出推斷的，不察蕭綱、徐陵編輯目的，及其「甄錄古人之作，尤不免強彼以就我」，遂如馮班一樣受到誤導，對鮑照詩遂以「淫豔」概括其風格。

四、餘　　論

如果說通過《玉臺新詠》來推斷鮑照詩風有其盲點，是因受其選錄作品的整體印象的眩惑，倘若僅就惠休存詩與鮑照相近的作品作比較，而不參照鮑照其它詩篇，所獲得的結果至多也是集體的或同類的風格，其實不能說明鮑照個

[65] 同上註，頁 122-125 、頁 148-151 。
[66] 參徐國榮：〈鮑照詩歌「險俗」釋證〉，頁 64 。
[67] 參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學史》，頁 269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詩風的獨特性。那麼，採取類似蕭子顯或鍾嶸那種傾向詩歌語言形式樣態的風格批評，是否較可突出鮑照獨特的詩風？或較具客觀性而可取得共識？

王闓運評語曰：

> 明遠詩氣急色濃，務追奇險，其品格卑矣；然自成格調，亦無流馳無歸。無識者乃以風韻獨出顏、謝之上，是不知翰林之鷙，而以為丹山之鳳也。鮑詩只是多琢句，精選詞，工布景，故格不得高，其勁氣纔足除冗弱耳。（《八代詩選》）[68]

這則評語，指出鮑照詩的風格樣式是「氣急色濃」，「氣」應是指行文的語義語法之節奏形式，「氣急」、「勁氣」言其形式緊湊，刻意講究詞句修辭和篇章結構，故給予低貶——「務追奇險，其品格卑」。王闓運的批評方式，與蕭子顯或鍾嶸頗類似，只是已經轉變爲通論鮑照詩的整體作品的語言特性，可視爲現代學者議論鮑詩「險俗」的先驅。然而，同樣由鮑照詩的語言形態而用「奇險」一詞評論，方東樹卻是給予肯定，其言曰：

- 謝、鮑、杜、韓，造語皆極奇險深曲，卻皆出以穩老，不傷巧。小才做之，即不穩，或傷巧而輕，或晦不解。（《昭昧詹言・卷五》）
- 鮑詩全在字句講求，而行之以逸氣，故無駢蹇緩弱平鈍、死句懈筆。他人・輕率滑易則不留人，客氣假象則無眞味動人。韓、杜常師其句格，衣被百世，豈徒然哉？（《昭昧詹言・卷六》）
- 明遠雖以俊逸有氣為獨妙，而字字鍊，步步留，以澀為厚，無一步滑。凡太鍊則傷氣，明遠獨俊逸，又時出奇警，所以獨步千秋。（同上）

方東樹所以能給鮑照詩極高的評價，可以發現儘管其批評仍然暗含著雅俗之辨，卻不像蕭子顯、鍾嶸、王闓運，過度高懸著崇雅卑俗的標準來作衡量，除了深入體察鮑照詩的語言表現樣式，又參考杜甫評鮑照「俊逸」一語，更經由與詩歌名家謝靈運、杜甫、韓愈和學習鮑詩的「小才」、「他人」比較；因此，方東樹對鮑詩的批評，可謂具有多重的辯證性，其結論是鮑詩鍊字造句沉

[68] 轉引自錢仲聯：《鮑參軍集注》，頁 45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穩深厚，不流於輕巧或晦澀，行文的語言節奏變化有致，且常有精警動人的詩句，似乎較王闓運中肯。

傳統文論或詩文評所運用的批評詞語，雖然不夠清晰，卻大多會暗示或傳達批評對象的客觀屬性，甚至作品的語言形式特徵，而其中也涵攝著批評家的感受反應和評價判斷。本文引述的許多文史資料都有這樣的性質，也都極富參考價值；受限於篇幅，本文討論的議題，主要針對古代給予鮑照詩負面評價的觀點，就已被引述的資料而論，鍾嶸《詩品》提供的線索最多，得以讓我們去探索鮑照詩在宋齊梁時的評價問題，理解這段時期鮑詩的追隨者及評論者如何看待其人與詩。而鍾嶸對鮑照詩的風格判斷，則是在顏延之、虞炎、沈約、蕭子顯的基礎之上，有更爲全面性的考量和客觀合理的評斷，「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即是經由與晉宋兩代四位詩歌名家的參照比較，概括其詩風，並給予較爲恰當的評價和歷史定位，文學史上劉宋詩人顏、鮑、謝三家並稱，[69] 確定不移地爲鮑照正名的，應是始於《詩品》。方東樹論及鮑照詩對後代的影響，並評論其詩風，討論方法頗與鍾嶸類似，實有可取之處。

倘若更作思考，這種對作品總體性的風格判斷和評價，乃是涵蓋詩人現存作品的批評，是整體作品的語言形式特徵的綜合性描述，在方法上又是與其他詩人的比較而作推定，雖然也能彰顯詩人獨特的風格，卻難免有其局限性。以鍾嶸品評鮑照詩而論，可能受限於《詩品》體例，如古詩與樂府體類不同，贈答與詠懷體裁有異，語言表現手法有其分別，籠統概論，如何使讀者認知詩人怎樣匠心獨運？何類詩歌最具特色？而沈約特別稱賞鮑照「古樂府」，蕭統《文選》亦選錄八首，數量僅次於陸機，似可反襯其不足。又鍾嶸評論鮑詩缺點「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滋生鮑詩「險俗」之歧解，王闓運則綜言「氣急色濃，務追奇險，其品格卑」；論詩以崇雅卑俗觀念爲批評標

[69] 嚴羽《滄浪詩話・詩體》，將顏、鮑、謝，概括爲「元嘉體」，見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 1978 年 5 月），頁 48 。陳慶元反對此說，見〈大明泰始詩論〉，《文學遺產》 2003 年第 1 期，頁 11-21 。案鮑照元嘉中期獻詩臨川王而入仕，應已在此時期以詩名世，似可稱元嘉詩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準，本無可厚非，然而傳統藝術理論或批評之中，道德倫理之「善」與藝術作品之「美」，往往混爲一談，倘若鮑詩「險俗」、「品格卑」，豈不是會讓人懷疑鮑照的道德品質？而隋代王通《文中子・事君篇》卻言「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70] 此篇議論事君之道，孔子言「狷者有所不爲」。如果王通的論斷有其事實，鮑照不僅非敗德之人，甚且可能是有道之士，而王通言「其文急以怨」，正是將文風與人格互爲辯證。鍾嶸評論其他詩人如李陵，曾由其人解說其詩，何以逕認定鮑詩「貴尚巧似」是「不避危仄」的主因？因此，通過作品外顯的語言形式特徵去進行風格判斷和評價，純從藝術表現技巧方面考量其審美目的，容易導致讀者朝向詩人之間的風格競爭一面來思考問題。但是，作品風格的形成，另有作者個性化的一面，詩人之所以如此選詞造句而呈現其語言風格，可能存有其內在的許多必然性因素。究竟是哪些因素促成鮑詩風格的獨特性？鮑詩不同種類的作品有何特徵？是否也表現鮑照個人存在經驗的多種樣態？這些與風格批評相關的有意義的問題，似乎猶待我們重新去加以認識。

（責任校對：黃美琦）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齊・沈　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11 月）。

梁・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11 月）。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1 年 10 月）。

[70] 見鄭春穎，《文中子中說譯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 月），頁 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梁・徐陵編、吳兆宜注、程琰刪補：《玉臺新詠箋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9月）。
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1月）。
唐・魏　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2月）。
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2月）。
唐・劉　肅：《大唐新語》（臺北：新宇出版社，1985年10月）。
清・吳　喬：《圍爐詩話》，收於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12月）。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收於《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册1519。
清・趙　翼：《廿二史箚記及補編》（臺北：鼎文書局，1975年8月）。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1月）。
清・許槤評選、黎經誥箋注：《六朝文絜箋注》（香港：中華書局，1987年1月）。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2月）。

二、近人論著

丁福林：《鮑照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
王志清：《晉宋樂府詩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7年6月）。
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所出版，1992年3月）。
王運熙、楊明：《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
古　直：《鍾記室詩品箋》（臺北：廣文書局，1990年12月）。
丘　敏：《六朝史學》（南京：南京出版社，2003年11月）。
石觀海：《宮體詩派研究》（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8月）。
李錫鎮：〈試論鍾嶸《詩品》與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的對立關係〉，《第三屆中國詩學會議論文集——魏晉南北朝詩學》（彰化師大國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系編印，1996年5月）。
胡大雷：《宮體詩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11月）。
郁　沅、張明高：《魏晉南北朝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10月）。
俞紹初：《昭明太子集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
徐國榮：〈鮑照詩歌「險俗」釋證〉，《中國韻文學刊》1997年第2期。
徐傳武：《左思左棻研究》（臺北：明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年12月）。
徐逸明：《徐陵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8月）。
貢布里希 (E.H.Gombrich) 著、范景中等譯：《理想與偶像——價值在歷史和藝術中的地位》 (*Ideals and Idols: Essays on values in history and in art*)（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9年7月）。
陳橋生：《劉宋詩歌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3月）。
陳慶元：〈大明泰始詩論〉，《文學遺產》2003年第1期。
曹道衡：《中古文學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7月）。
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12月）。
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學史料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7月）。
曹　旭：《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
曹順慶、李天道：《雅論與雅俗之辨》（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5年11月）。
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8年5月）。
趙品甫：《史通新校注》（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年8月）。
鄭　騫：《龍淵述學》（臺北：大安出版社，1992年12月）。
鄭春穎：《文中子中說譯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
錢仲聯：《鮑參軍集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2月）。
興膳宏著、彭恩華譯：〈《玉臺新詠》成書考〉，《六朝文學論稿》（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6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劉躍進：《玉臺新詠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7 月）。

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論文雜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年5 月）。

鍾　濤：〈「休鮑」體發微〉，《雅與俗的超越——漢魏六朝及元代文學論集》（成都：巴蜀書社，2001 年3 月）。

繆　鉞：《讀史存稿》（臺北影印本，無出版年月）。

鄺健行：〈論顏延之對鮑照詩的貶評〉，香港中文大學中語系主編，《魏晉南北朝文學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11 月）。

蘇瑞隆：《鮑照詩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1 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